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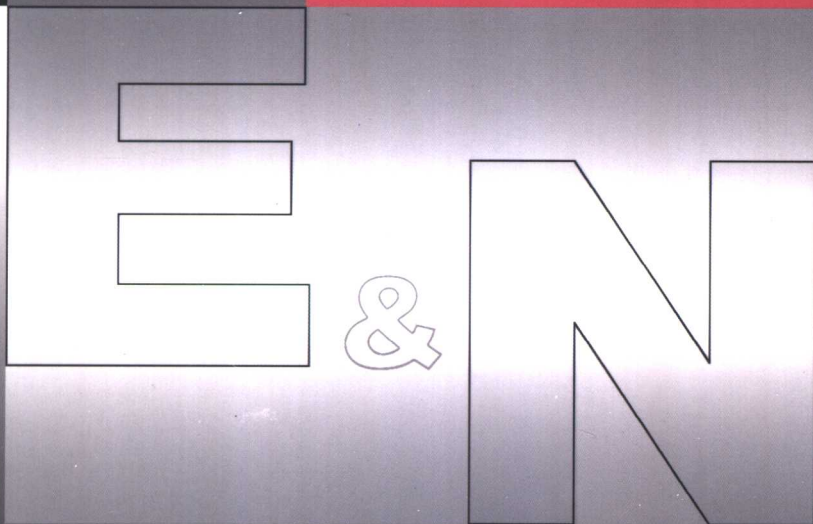
[英] 安迪·格林 著

朱旭东 徐卫红 等译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教育与国家发展译丛



丛书主编 顾明远
执行主编 朱旭东

教育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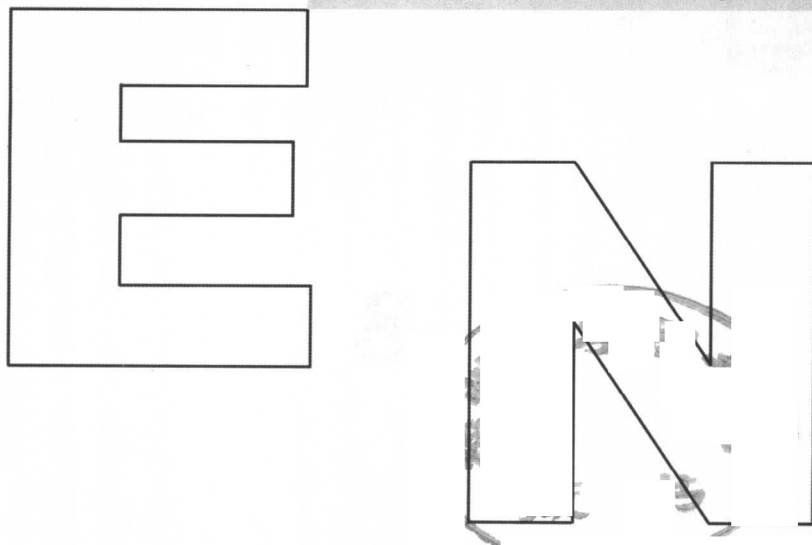
朱旭东 徐卫红 等译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教育与国家发展译丛

丛书主编 顾明远
执行主编 朱旭东



G40-029.3
23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 (英) 格林著; 朱旭东等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7

(教育与国家发展译丛 / 顾明远, 朱旭东主编)

书名原文: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ISBN 7-5041-2814-7

I. 教... II. ①格...②朱... III. 教育—国际化—
研究 IV. G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5810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2-6445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2003339

邮 编 100088

编辑部电话 010-62367492

传 真 010-62013803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187 千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印 数 1—5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安迪·格林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教授，英国教育和技能部（Th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投资的学习高回报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the Wider Benefits of Learning, CRW-BL）的主任之一。他主要从事的是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比较研究，主持过英国政府部门、CEDEFOP 的若干研究和咨询工作以及 OECD 和欧盟第 22 起草小组（主持研究欧洲教育和培训体系之比较研究）等国际组织的项目。他是英国教育和技能部特别研究小组——教育与技能审定委员会、英国政府技能策略领导小组的成员，曾负责 1993 年英国技能白皮书（the 1993 White Paper on Skills）规划工作。他当前在 CRWBL 开展了一个项目，主要是研究学习对市民参与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其主要著作包括：*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与 Phil Brown and Hugn Lauder 合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Europea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与 Alison Wolf and Tom Leney 合著），IOE, 1999；*Further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Realigning the Sector for the 21st Century*, IOE, 1999；*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Macmillan, 1997；*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al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Macmillan, 1990。

中文版序言

这里集结的论文在1997年首次以英文出版，随后于1999年翻译成日文出版。现在它们又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从而可以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期望读者们能够发现其中的观点与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密切相关。

本书的内容是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写成的，它们涵盖了的主题广泛，但是在这些主题之间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内在联系的。它们都涉及到了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诸多方面——即国家政策、结构、过程和结果，它们主要侧重于中等和中等后教育阶段，而且在方法和范围上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和国际的特征。较早写出的章节基本上是欧美方面的。然而，自1995年以来，我的研究日益集中在东亚，因此许多章节反映了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发展，当然还有欧洲。^①

一直到最近，横跨欧亚的比较教育的文献还相当缺乏，也许是因为文化差异限制了比较方法的运用。然而，东亚和欧洲都认识到许多教育方面相同的问题和困惑。区域之间政策的借鉴日益频繁，即使决策者们对对方背景的理解并不充分。这些论文有望弥补本领域内比较教育文献的有限性，它们将会促进对复杂背景的差异进行深入了解，因为这些差异决定了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形成的过程和结果的变化。

① 参见P. 布朗，A. 格林和H. 劳德著：《高技能：全球化、竞争和技能形成》（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本书原本想写成早先出版的《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一书的续集，因为那部著作没有提供 19 世纪以后的教育比较史，那仍将是未来的一项计划。但是它试图廓清这项研究计划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努力想理解现代全球时代民族性国家教育的意义所在。全球化显然对民族性国家体系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不论在教育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是一样的。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发展的全球化理论似乎表明了，国际趋同成为了今天的秩序，因此它不再为民族性国家道路和民族性国家体系而写作。教育和国家形成理论在今天因而变得无用武之地了。这就是促使我写作《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这篇长文的背景，并恰好在此书中发表。

有许多作者把全球化理论运用到了教育上，这表明了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在消退，因此跨国比较研究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这实际上被误导了，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争论的。^① 教育的众多领域可能越多越国际化了，尤其在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同样，跨国的政策借鉴变得日益普遍，还有影响日盛的国际团体，如 OECD。这就导致了明显的国际趋同，至少在政策的措辞层面。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政府并不准备放弃他们在组织这种体系中的角色。它们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聚合而言至关重要，无论如何教育仍然是许多国家少有的几个政策领域之一，因为政府仍然认为应当对它加以控制。教育体系的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性没有改变，至少在学校教育的强迫义务阶段是这样，在实际的结构和过程层次上也不存在体系内的完全趋同性。^②

对教育体系进行比较研究还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全球化无疑压缩

① A. 格林，《教育、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作用》（2002 年），教授晋升讲演，教育学院，伦敦。

② 在 A. 格林、A. 伍尔芙和 T. 勒涅著的《欧洲教育和培训体系中的趋同和分歧》（1999 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中对欧盟国家的情况做了评述。

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时空维度，它比以前更加认识到了国外教育体系的可利用性。全球化确实重建了全球的政府制度，使超国家和亚国家地区更显重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比较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是无关紧要的。比较研究不仅仅要研究外国体系，它要利用系统化的比较分析方法深入了解教育与其存在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因果关系。全球化并没有消除社会的差异，只要存在可分析的社会差异，比较方法就依然会是一种最强大的工具。当然，比较学家现在日渐把比较单位超越国家层面，但只要教育体系主要还是在民族国家界线内来组织，跨国比较仍将是重要的。

这里的所有论文试图通过系统的跨国比较来理解社会背景和教育体系、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们表明了在教育发展中仍然还存在着道路决定论，国家之间的差异还将继续。

自 1990 年以来的 10 年间，政治经济已经从趋同论转向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差异的新认识上。以前提出的假设是，冷战结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单一经济模式的成功。现在政治经济日益认识到了国家对全球化所做出的反应多样性以及高级经济的多元模式。教育理论经常跟不上政治经济的步伐。然而，正如本书所讨论的，比较学家们似乎可以继续研究不同国家的教育路程，前景依然看好。

安迪·格林

2002 年 12 月

译者序言

《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者安迪·格林在继《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①这部比较史研究著作之后的另一部探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教育的力作。此书被西方教育学术界视为第一部探讨全球化与教育的关系问题的著作。格林教授在对欧美、亚洲国家的教育历史和比较研究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在不同地区教育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变革关系，他针对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终结论而提出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远没有过时的观点，并在此书中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

格林是在“后现代主义与国家教育”的关系命题中展开对还没有过时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论证的。格林从“教育市场的迅速崛起最好理解为后现代现象”的当代历史事实中来回答“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理论有何贡献”问题，他看到了在教育理论中运用了后现代方法，但指出“现在还没有后现代教育理论”。从总体上说，格林对后现代主义持否定的立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能为教育理论提供

^① Green, Andy,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 of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安迪·格林著，王春华等译，《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带来了许多危险。后现代主义者与提倡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强调择校和学校多样化,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教育市场的理论背景与新自由主义不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选择和多样性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不断变化的必然伴随物,由于社会具有广泛的异质性和碎片化,因此,教育体系内部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碎片化也不可避免,而这是无法抗拒的。格林强调,这种择校与学校多样化的自由市场教育政策存在太多的危险性,因为“通过市场调节形成教育体系很可能不如通过公共权威调节形成的教育市场民主,因为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统一的标准不被看好,反而更强调供给与产出的不均等”。格林对择校和自主性的学校政策持怀疑态度,因为“自由市场论的逻辑是极端粗糙的”。这种逻辑就是择校可以带来竞争,而竞争会增强自主性,自主性会导致多样化,最终多样性会提高办学效率,提高成绩。而格林认为,这种逻辑“可能使教师负担过重,加重他们在管理、市场和筹措资金等方面本来就不擅长的责任,最后致使他们没有精力完成教育这项主要工作。”“竞争也很可能导致原本地位不利的学校自暴自弃,而造成质量下降。”“提高学校自主性很可能不会增加高水平专门学校的多样性,反而会由于所有学校都竭尽全力地扑在提高家长最重视的学业成绩上,以求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而造成新的统一局面,因而减少当前学校的多样性。”格林也提出了“择校运动的老前辈”——丘伯和默^①的统计方法是有明显缺陷的,因为他们在其样本中没有提供能够说明在教育施行期间,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获得了更多附加值的数据。另外,格林还描述了执行教育市场化政策的国家的不同情形,如美国、英国、新西兰、匈牙利、波兰、前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法国、瑞典,同时他也谈到了

^① John E. Chubb and Terry M. Moe, *Politics, 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0. 约翰·E. 丘伯和泰力·M. 默著, 蒋衡等译, 《政治、市场和学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亚太国家和地区。但在译者看来，他对亚太地区的教育政策的判断似乎不够准确，事实上，我们对我国采取的“教育市场化”政策也怀有与格林对西方国家采取的自由市场政策一样深深的忧虑。^①

格林把后现代主义与国家教育联系起来考虑问题的连接点应当是“后现代主义反对国家共同课程”的观点，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者唐纳德（James Donald）看来，没有所谓不因阶级、种族、性别和地域而有所不同的“共同文化”这类事情。格林认为，后现代主义持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政治，后现代主义在肯定边缘文化和被排斥的文化的价值的时候，却通过课堂文化政治的“自由市场”，以强大的主流话语继续将其他的声音边缘化，因而教育均等成为一种幻想，格林主张“取代单一文化的、排外的国家课程的最好措施不是全部取消共同课程，而是在可一致地应用于所有学校的共同课程的框架内形成更具包容性和真正多元的模式。”格林以他的教育史研究的视野论证了“19世纪欧洲发展起来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为包含巨大差异和分裂的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否定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终结论”，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建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强社会团结和培养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社会，这种功能仍然存在。

二

格林在否定了后现代主义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终结”论之后，延续了他的“国家形成”概念再一次阐述了教育与“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里他又运用了另一个政治学概念，即“发展性

① 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主张“终结”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倡导消解或解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对此，在一个尚处于多元社会结构和形态的国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充分实现普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基础上追求教育质量的一个产物，它是在普及条件下追求教育优异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它不适宜于我们一味地借鉴，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追求公正、均等的教育政策价值观，事实上，我们还需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

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他以此概念进一步探讨19世纪欧洲、亚洲和北美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形成的原因,但其实质的目的还在于论证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远没有终结的观点。“教育在所谓的‘发展性国家’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并且一定时期内教育的迅速发展与由政府的发展性抱负产生的强烈的国家形成过程紧密相连。教育的迅速进步,既是发展性国家产物,也是它得以运转的重要工具。”格林以“国家形成”、“发展性国家”的概念来研究世界各国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并试图说明他们之间的重要关系,有关的论证过程反映在本书的第二章,我在这里不想累赘,相反要探讨的是格林在提出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教育史学理论,也就是吸引西方教育史学界眼球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发生学(origins)。

“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发生学在过去20年里一直是教育史学主要关注的领域之一,而最近国家形成提供了又一种重要的解释范式。”^①这种范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格林在1990年出版的《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一书是对这种范式研究开始以来的一次总结,并且于1993年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教育史协会上再一次对这种范式进行探讨。

在对民族国家教育体系起源或发生学研究的时候,西方学者还运用另一种表述,即大众学校教育(mass schooling或education)的发生学。研究这个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国家与其庶民或市民(公民)之间、社会阶级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获得的权力关系,及其对大众教育体系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同时还需要解释不同国家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不平衡的历史发展,包括18世纪此体系早发的绝对专制主义的国家。

^① Green, Andy,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Revisited', History of Education Review, 23, 3, 1994, in Roy Lowe, ed., 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II, Educa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Falmer/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0, p. 303.

从教育史学流派上看,“国家形成”范式是在历史修正主义学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的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它继承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历史修正主义学派(也称修正主义史学)的史学思想,尤其是迈克尔·凯茨(Michael Katz)的思想。修正主义史学的开端是巴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1960),这个时代的美国教育史学家试图揭露辉格派史学家把19世纪教育描述成为民主理想主义的胜利的虚伪性,取而代之的解释是,这个世纪的教育具有早期国家教育的先驱者追求的阶级性质。这种解释得到了教育史学界的广泛认同,此后通过凯茨、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等教育史学者的努力完善了早期修正主义的教育史学范式。到1976年,凯茨对“社会控制”理论感到了思想的不安,因为这种理论只是把国家教育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对不情愿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单线强制,因而寻求一种解释,辩证地构建权力关系的复杂而交互的性质,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作为走出早期修正主义史学的理论局限的途径。布鲁斯·柯蒂斯(Bruce Curtis)利用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加拿大教育国家(educational state)的内部权力的分散;伊安·戴维(Ian Davey)和帕夫拉·米勒(Pavla Miller)运用家长制和家庭形成的理论理解教育国家形成,而本书作者安迪·格林则使用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解释不同社会国家与学校教育之间的不同关系。

一直困扰着西方教育史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史学问题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不平衡的历史发展。玛格丽特·阿修(Margaret Archer)在其比较史学著作《教育体系的社会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 Systems, 1979)中明确指出,现行的教育变革理论在解释不同国家教育发展的不同时间和模式问题上的乏力和不足。把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产生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联系起来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为何首先发生在像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这样的前工

业化和以农业社会为主的国家，而不首先发生在像英国这样工业起飞早、城市化发展快的社会呢？于是阿修以制度变革过程为理论基础把教育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视为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产生的根源。格林认为，阿修的史学理论实际上为史学界以国家维度来构建教育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要做的是确立何种国家理论。当然，国家形成的史学理论的确立是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国家退出前沿”的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新右翼的产生而提出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有关，20 世纪 80 年代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至少在英语世界提出了新的自由市场教育意识形态对历史学家思考以前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挑战，修正主义教育史学家不相信自由市场在教育中的有效性，并且怀疑新自由主义史学家威斯特^①对 19 世纪英国自由放任政策在教育领域推行所表现出来的优势的观点。为了寻求一种能够应付挑战的解释理论，史学家们利用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国家形成理论，它们激起了对葛兰西及其对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的论述，恰好此时出

断于吉利根 (Gilligan) 和塞格尔 (Segal) 的著作《巨型世界》(The Big World)。

论，尤其可以说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晚发的根本原因。格林指出，解释教育体系发展的时间和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属性和国家形成的过程。在格林看来，创建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推动力在于：为国家培养训练有素的行政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军事人员；传播主流的民族文化和灌输普遍的主权（nationhood）意识形态；铸造萌芽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和团结，巩固其主流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格林不否认其他理论在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里的教育需要的合理性，但国家干预无疑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形成的首要因素，而恰恰不同国家的国家性质解释了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特殊民族模式和发展。当然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展起来的，尽管这种体系的模式首先是在欧洲大陆18世纪绝对君主制统治期间预想的，这些统治不仅形成了现代国家的许多普遍的特征，如中央科层制、常规军、国家税收等，而且开创了为学校教育提供国家资金，规定了课程，制定了入学的法律以推动公共教育的先锋，教育被视为实现国家重商主义政策和目标的重要手段。它还是在人民中间推行政治忠诚和根据统治阶级的形象塑造凝聚性的民族文化的强大工具。在格林的理论中，19世纪的教育体系承担着国家道德、文化和政治发展的首要责任。“它成为了世俗宗教”，用来同化移民文化、发扬确立的宗教信仰、传播指定的民族语言的标准模式、促进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普及日常和理性统计的新习惯、鼓舞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教导道德纪律，总之灌输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信条。它同时有助于构建公民资格的主体性，使国家对人民控制和人民对国家忠诚具有合法性。它把每个人塑造成为一般的公民，但有根据阶级和性别从事不同的工作，它要铸造负责任的公民、勤劳的工人、心甘情愿的纳税人、可信的陪审员、尽职的家长、本分的妻子、爱国的战士和独立的选举人。

格林认为，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形成首先也是最快发生在那些国家形成的过程最强烈的国家，有三个因素促使了国家形成或“民族

建设 (nation-building)” 迅速推进, 一是外部军事威胁或领土冲突; 二是由于革命或独立而导致的内部重要变革; 三是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相对落后而推行国家倡导的改革计划。而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都与这些因素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

但无论如何, 格林也承认, 他的理论只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发生和及其在不同国家不平衡发展的根源的一种解释, 这也修正了他在早先出版的《教育与国家形成: 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一书中的“一元论”的思想, 并且他想形成一种理论可以考察后发国家在国家形成不同过程中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产生的根源, 于是他把其理论基础从国家形成扩展到了与此相关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上, 而且从空间范围上, 也由欧洲、北美的早发民族国家扩展到了东亚国家和地区, 甚至在时间上从 18、19 世纪延伸到了当代, 尤其是在面对经济全球化、超国家组织的崛起, 以及区域主义抬头, 教育的分析已经与民族国家的距离日益拉远的现时代。格林坚守着自己的理论阵地, 在面对后现代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的鼓吹者把教育从集体目标向个人主义化和私人化的消费主义目标转型中绝不动摇, 确实显示了一名学者的理论品性, 这种对自己理论的执著也缘于现实, 民族国家的政府仍然在利用教育寻求国家目标, 无论是全球经济竞争的需求还是社会凝聚力的需要, 教育仍然是民族国家制定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但格林也看到了, 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国家对教育需要的目标, 于是他在本书中进一步探讨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三角关系”。

三

格林在解析这个“三角关系”的时候, 仍然把靶子对准了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家的观点, 即全球化预示着民族性国家教育及其体系的终结。格林延续了他一贯坚持的历史比较方法的禀赋, 终结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论。就教育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阐

述的，教育与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紧密联系的。需要指出的是，格林基本上排除了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发生的经济因素。“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并非早期工业化的一种技术需要，尽管它们在后来的工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也不是在失范和阶级分化的城市环境中产生分化和冲突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反应。首先，就其重要的方面而言，它们是中心国家为了塑造公民民族的一种工具，公民民族赋予其合法性并确保它们继续存在。”但公民民族的塑造在有着多样化文化的欧洲国家需要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格林探讨的民族主义。它强调语言、传统文化，在极端形式下还强调种族。从早期法国的自由的民族主义和德意志浪漫民族主义，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甚至到战后民族主义，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不强调教育的作用，格林并以新加坡国家形成与教育为例来实现其理论的适用性，在他看来，新加坡之所以是“一个坚固的国家 and 有很强凝聚力的社会”，是因为教育在新加坡国家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个与全球市场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世界化国家里，一个显然是‘国民’教育的制度继续存在下来了范例。”

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全球化理论似乎预示着民族性国家教育的基础不复存在，其传统将会消失，政府将不再控制他们的教育体系。格林通过对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不同表现的分析，提出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通过新形式的缔约管理，运用目标设定、质量控制和以绩效为本给予资助的整个机构，极大地加强了对教育、健康等领域的控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发现，要保持社会凝聚力和团结越来越困难，个人主义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世俗化、社会流动和稳定社区的衰落都在起作用，甚至主张全球

化的赖克在《国家的作用》^①一书中，也描绘了一幅美国社会解体的骇人场景。在格林看来，民族国家不会看着这种乱景而置之不理。同样后现代主义在对教育做出判断时与全球化理论如出一辙，国家在教育中的目的只局限于“在全球竞争条件下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格林明确反对这种对教育的偏激观点。有趣的是，他以“教育体系部分国际化”来替代“教育全球化”的概念。“通过增加学生和教师的流动、广泛的政策借鉴以及加大初中和高中课程中国际方面内容的重要性，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部分国际化了。”格林也注意到了信息新技术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但他认为无论何种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对孩子进行照管、教导使之社会化仍然需要身体上的亲近、接触和公共机构提供的活动场所来支持这些过程的实现。”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去制度化的教育”是不可能的。格林还分析了欧洲内部的教育和培训体系的相互交流情况，指出了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加大了国际间的相互渗透，但它们并不表明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本身的终结，国家政府仍然主要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制度，并仍然利用它们来实现国家目的。在绝大多数国家，形成公民群体和形成民族认同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国家课程仍倾向于大力强调民族国家、语言和文化，历史被用来普及国家神话和促进民族认同，公民和道德教育被用来灌输民族价值观和良好公民的观念。“大体上，运用教育实现民族认同的塑造已经是新型民族国家和战后或革命后国家重建中极为普遍的历史现象了。”在面对全球化的异质化的世界里，格林从“国家形成”转向了“社会凝聚（cohesion）”的研究，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政府和教育在未来的世界里面临的困境“怎样通过适合于现代环境而且有利于深化民主和加强社会团结的方式，重建公民文化和民族国家地位的文化”。

^① [美] 罗伯特·赖克著，上海市政协编译组和东方编译所编译，《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